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

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 安徽 合肥 230022)

编者按:邓小平1992年春天发表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值此南方谈话发表10周年之际,安徽省委党校举办了专题理论研讨会。会议由副校长林世昌同志主持,常务副校长黄家海等16位同志在会上发言,就南方谈话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对进一步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贡献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入的研讨。现将研讨发言摘要发表,以表对南方谈话这一光辉文献的纪念。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朽丰碑

黄家海:邓小平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和中国化的光辉典范,是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最终形成的标志,是理论创新的不朽丰碑。首先,推进理论创新,是南方谈话的显著特点。这个谈话抓住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长期困扰人们的根本性问题,从理论上作出了回答,如社会主义本质论、市场经济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以及中国的长治久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等等,都具有长远的理论价值。正是南方谈话的理论创新成果,才为我们这10年的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其次,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思想理论之花结出的丰硕果实,验证了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任何一种新运动的兴起,任何一种新制度的诞生,任何一种新事业的推进,都离不开一定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个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列宁主义之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思想之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改造、邓小平理论之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理论创新引导社会变革、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好说明。我们正在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许多是马克思主义老祖宗没有说过、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这正是理论大有作为的时候,是需要理论和产生理论的时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结合变化的实际,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拘泥于个别过时的结论;既珍惜已有的成果和经验,又不断地有所创新。再次,从南方谈话及其理论创新的特点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及其核心多次强调并十分重视理论创新问题。四十多年前,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写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任何国家的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另一方面,他又多次指出,现在的世

界形势日新月异,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南方谈话就是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最好体现。江泽民同志也反复强调理论发展和理论创新问题。他强调指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关键是要掌握其理论实质,善于把其基本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勇于创新。”这些重要论述,精辟揭示了理论创新与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赋予了理论创新的深刻时代意义。

理论创新是党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的需要。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这一重要思想,揭示了理论创新与党的命运的关系。党的十五大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坚持理论创新,就是这一历史责任的内在要求。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在坚持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要求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在坚持邓小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在坚持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在坚持邓小平党建理论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等等。正因为有这一系列不断推进的理论创新,我们党才始终掌握住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权,才经受住了国际国内各种风险的冲击和考验,取得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成就和新发展。面向未来,只有继续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我们党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真正做到“三个代表”,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进行理论创新,需要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作出努力。从根本上说,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面向新的伟大事业,为亿万人民的实践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源泉。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可以说,8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与我们党进行理论创新分不开的。当今的时代是创新的时代。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更好地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我们党就会永葆生机,我们的事业就会充满活力。

王健华:邓小平理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比较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创新发展的思想轨迹。第一,南方谈话和“三个代表”都建立在对唯物史观的准确把握上,科学地突出和运用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终极根源和核心内容的根本观点。南方谈话发展了“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等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提出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七一讲话”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即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的规律的高度,深刻地揭示了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实现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联系,科学地阐明了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根本条件和物质基础。第二,南方谈话和“三个代表”的最高价值目标,都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此为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和江泽民建构了推动社会主义整体协调发展的理论范式。南方谈话把判断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标准,归结为“三个有利于”,形成了一个以生产力标准为基础、以人民利益标准为归宿、以包括经济、政治、文化要素在内的综合国力标准为必然要求的完整体系。“三个代表”紧紧抓住历史发展的三个根本问题,系统地分

析和阐明了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三大关系的生产力尺度、文化尺度和人民利益尺度,并且深刻地阐明了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因而形成了一个涵盖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贯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不仅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而且从根本上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历史课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章建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我们时代实践所呼唤的一种科学的思想理念。实践反复证明了我们革命和建设成功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邓小平南方谈话是思想解放的光辉篇章,是一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史丰碑。南方谈话通篇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都有新的突破和新的解放。今天我们纪念南方谈话,最为关键的是要重温它的精神实质,领会其中所凝聚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这就是要在新的历史征途中,努力进一步坚持好、实践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不断解决我们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任务,把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当前,我们已经顺利地迈入了新的世纪,并成功地加入 WTO,我国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正在蒸蒸日上地发展着,前途充满着光明和希望。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仍然面临着许多尖锐的挑战,客观上需要我们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努力推进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要自觉做到把思想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对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积极探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然而,从目前的实际来看,我们仍然存在着思想解放不够的问题,存在着对一些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深刻、不准确、不全面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彻得不够。特别是在对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还存在着消极认识。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分离论”,即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分离,没有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看作为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要么片面强调解放思想,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脱离了客观实际,违背了客观规律,结果必须遭到挫折和失败;要么单纯强调实事求是,但是思想不解放,在实践中不敢“闯”,求稳怕乱,瞻前顾后,因循守旧,仍然按照老条条、老框框、老经验、老思路。思想严重落后于客观实际,显然是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的。(2)“无用论”,这种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领导的事,是上级的事。自己职位低,权力小,没有必要考虑如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跟着上面走,领导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领导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不动脑筋,不思进取。这种思想是十分可怕的,因为它严重缺乏社会责任感。(3)“到位论”,这种思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解放思想已经解放得差不多了,再要解放思想,就会过头了。因此,不要再提解放思想了。这种思想显然是落后的、保守的,它是一种“左”的思想意识的表现。持这种思想的人必然会阻碍我们的改革进程,必须会对改革中的一些新思想和新做法提出批评。(4)“实用论”,这种思想的危害性很大,有这种思想的往往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庸俗化。他们也强调解放思想、也追求实事求是,但是他们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小团体的利益,为了部门的利益,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们也在积极研究和思考问题,探索规律,而这些问题和规律都是在为了个人、小团体的需要。甚至于出现了为实现个人需要的满足,可以抛弃一切正义、公理和原则,可以违背道德规范,可以践踏法律的尊严。(5)“速成论”,这种思想实质和“到位论”有着共同的性质,就是没有认识到“解决思

想、实事求是”的艰难性、复杂性,没有认识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无止境的历史过程。(6)“自然论”,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人为的主观选择。认为随着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自然会得到解放,人们对各种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会自然实现。这种思想过分强调思想解放的现实历史条件,而忽略了人的主体自觉能动性。这些错误的思想认识严重影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从科学的思想理念转化为鲜活的社会实践。因此,我们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进一步实践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法和途径。一方面,我们要在提高主体素质上下功夫,通过提高主体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解决善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通过提高主体的思想政治素质来解决勇于和敢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要努力改造客观社会环境,加快民主化进程,不断创造有利于人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制度、科学体制和科学机制。

胡忠明: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不仅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又一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转折关头的政治宣言,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特别是在以下五个方面作出了实事求是的重大决断。

第一,“南方谈话”深刻总结我党执政建设和国际共运史上党的建设的深刻教训,明确指出,党的建设攸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第二,“南方谈话”深刻总结党的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组织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干部队伍建设重要的是接班人的培养,这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需要,特别是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的当然要求,也是两任总书记留下的沉痛教训。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重申了“四化”标准和德才兼备的原则,特别强调:“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进入新的领导机构。“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

第三,“南方谈话”深刻总结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要克服形式主义的作风。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会议多、文章长、讲话长,内容重复,要精简,要克服,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第四,“南方谈话”深刻总结党的思想建设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邓小平还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第五,“南方谈话”深刻总结党的历史上两条战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反倾向斗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认为从党的历史上看,“左”比右更易迷惑人,更根深蒂固,危害也更大。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右”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左”表现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所以,“南方谈话”同样是一篇总结党的建设经验,揭示执政党建设规律的重要文献。

郝欣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左”的东西,或者说就是要求我们把思想观念从“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实质。在南巡讲话发表十周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它、学习它,主要应当把握这个精神实质。只有把握了这个精神实质,才能真正领会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才能在今天的实践中更好地坚持、贯彻邓小平理论和南巡讲话,进一步推进思想解放

和改革开放。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奠基人。在我们党 80 年的奋斗历程中,在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带领下,我们党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三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三大理论成果。在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经过遵义会议特别是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使我们党从教条主义影响下的错误路线中解放出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实际相结合,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南巡讲话,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使我们党从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的教条主义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坚持、运用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一步同当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经过十四大和十五大,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发表了“七一讲话”,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性质以及时代先进性作出的新概括,使我们的思想从旧体制、旧观念、旧习惯中进一步解放出来。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党历史上三大理论成果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逐步递进的过程。其中,邓小平理论尤其是南巡讲话无疑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邓小平理论和南巡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的思想历程经历了几次重大超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超越了“姓马”与“姓修”的思想纠缠,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南巡讲话和十四大超越了“姓资”与“姓社”的思想纠缠,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十五大超越了“姓公”“姓私”的思想纠缠,开始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七一讲话”超越了“有产”“无产”的思想纠缠,重新认识现阶段我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社会实践永无止境,思想解放也永无止境。目前,我们已经跨入新世纪,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七一讲话”以及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对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今年将召开党的十六大,十六大的召开必将成为思想解放的又一个里程碑,使思想解放的步伐由经济领域向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推进。江泽民同志指出:“开好十六大,关键抓住两条,一条是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一条是对我们面临的、广大干部群众十分关心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要进一步作出回答,以更好地指导实践。”因此,目前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思想理论工作任务是:进一步深刻领会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实质,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七一”重要讲话和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切实做到三个“解放出来”,实现思想理论的新超越,以新的精神境界迎接十六大。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刘 璐: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理论:“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归根到底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理论同他在同篇讲话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计划及市场与社会主义制度关系论,成为邓小平理论的精华。八年后,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内在的逻辑关系上看,“三个有利于”与“三个代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前者是后者的起点,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发展。将二者联系起来看,更有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邓小平理论。

“三个有利于”与“三个代表”都是关于判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是否合理、是否正确的标准和准则,围绕着生产力或先进生产力、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源泉、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合理性都可以归结到这些方面。具体而言,“三个有利于”的第一条,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三个代表”的第一条,代表先进生产力,这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是最根本的基础性的决定性的东西,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共产党人的天经地义。“三个有利于”的第二条,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三个代表”第二条,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综合国力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诸因素的整体性概念,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物质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三个有利于”的第三条,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代表”第三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都是从人民出发,以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最终归宿,即以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为落脚点。由此可见,“三个有利于”与“三个代表”,无论从整体的精神实质,还是从具体内容上的对照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一脉相承的关系。“三个有利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要搞革命、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三个代表”又把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发展,怎样才能执政,才能富有活力的原因和目的作了深刻系统的阐述。“三个有利于”与“三个代表”如此高度一致,不是机械的、偶然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理,社会主义是不是真理,都要看是否注重先进生产力,是否重视精神文明、先进文化,落脚点是,是否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主义,必然地具有理论逻辑的一致性。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这应当是我们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学习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得出的重要结论。

唐文成:在不断探索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党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贯通邓小平理论的一条主线就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谈话”中的“本质论”,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清楚地表明了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邓小平不是复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见解,而是以崭新的观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他提出了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发展,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样一种思想,这是本质论的精神实质。因此,社会主义本质论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相比有三个根本的不同:第一,它从生产力出发来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点不仅能把握社会主义不同历史阶段的共性,而且也是由现实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决定的,它体现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第二,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只要能最大限度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都可以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体现了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基本原理。第三,它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而不是看成一个固有的模式。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共同富裕是目的,发展生产力是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这两条贯穿社会主义从低级到高级发展过程的始终,因此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要求,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无论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如果它们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那就必须要发生调整 and 改革”。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地去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在理论上不断地创新发展。

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具有非常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的

思想解放。本质论的提出,从根本上解决了当代社会主义发展中长期没有解决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十多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人们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其次,它抓住了本质,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把非本质的东西排除在社会主义的定义之外,为社会主义正了名。第三,它把发展生产力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就使一系列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问题豁然开朗。比如,为什么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什么要坚持对外开放?为了更好地吸收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要解放思想?因为“左”的东西还在困扰着我们,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为什么要寻找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就是为了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等等。最后,本质论的提出,使判断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是与非、所有制形式与结构的优与劣有了明确依据,这个“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胡东升: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和方法。第一,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进一步向世界表明中国人民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应当体现出超过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价值目标的本质区别。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学习借鉴的必要性,“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由过去的军事竞争为主转变为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因此,“社会主义中国”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第二,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科学把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南方谈话为经济落后国家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有益东西,拓宽了新的途径。第三,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问题,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眼光观察世界,紧跟时代潮流。社会主义要在全球化进程中,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积极对外开放,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长补短,寻求发展。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尤其要密切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并进而发展社会主义自身。马克思主义政党要自觉地坚持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既要坚持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又要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既要有远大理想,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要在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中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宋周尧：邓小平南方谈话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认识提升到新的科学水平，开拓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第一，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对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科学认定；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科学阐释，从而完整地、系统地、本质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了科学界定，这是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重要论断，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是我们判断各项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第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南方谈话明确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同时，又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南方谈话阐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应有的科学态度，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同时，要在新的时代和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还用精炼的语言阐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方法和根本目的。第三，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问题上，南方谈话提出，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试敢闯；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不搞争论；特区“姓社不姓资”，“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这些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科学地阐述了创新精神在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科学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方法、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第四，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上，南方谈话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只要是讲质量，讲效益，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国经济的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定协调地发展；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南方谈话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要性、重点方向、基础条件及可持续性，从而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此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组织保证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环境上，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上，南方谈话都作出了新的科学分析和重要结论，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南方谈话所提出的上述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又突破了以往认识上的局限，科学地解答了人们思想和实践中的困惑，推动了思想上的大解放，迎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南方谈话发表十年来的伟大实践，使邓小平理论更加深入人心，并日益显示出其巨大的精神力量。

倪晶玉：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观点，贯彻于邓小平理论的始终，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明确提出，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亚洲四小龙，“这才是有中国的特色的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和教育科学文化两个方面的内容。前者决定整个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解决整个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问题；后者是文化建设的智力支持、基础工程，解决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问题。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数以亿计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关系到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为了达到文化建设的目标，中央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尤其是在90年代中期，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把科学教育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全面部署。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纲领，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思

想、目标任务和方针原则,解决了文化建设的方向问题,是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成就。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

近两年来,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地创新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使社会全面进步。去年初他又提出“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强调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下半年出台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具体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将对思想道德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邓小平关于两个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理论保证。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指针

姜彦秋:邓小平在南方视察过程中,坚定地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以新的观点、精辟的创造性的论述,充实、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所规定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具体核心内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控制人口,抓好教育与科技,就要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这些都是落实“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手段。

第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控制人口、抓好教育与科技。控制人口,抓好教育与科技,把握人才是第一要素,唯此,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高瞻远瞩地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们一定要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十年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从事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与教育,新世纪我国的发展以及未来更长久的发展寄望于知识经济。

在“十五”期间,我们要在控制人口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科学素养。只有人的综合素质提高,才能坚持创新,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从追求数量增长转向追求科技创新、效益增长。只有真正把握人才是第一要素,才能在新世纪,在激烈的国际、国内环境的竞争中,克服困难,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第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步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指出,“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这意味着一个新的里程碑的序幕拉开了。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被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以积极的态度,求实的精神,有条不紊地踏上新的征程,以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

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我们有国际与国内的不少有利条件及竞争的压力,我们应抓住机遇,利用条件克服困难,采取有效的途径与措施。主要的途径之一是扩大内需。坚持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扩大内需需要搞好“五个结合”,即把扩大内需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

调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增加就业,可持续发展相结合。这是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应采取的途径与措施。

第三步战略部署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也是在我国告别短缺经济走向供给有余的背景下进行的,是在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主动调整。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具体任务就是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实施技术创新工程;促进城乡、地区结构协调发展。

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的主要途径之三是加大改革开放,促进体制创新,转变政府职能。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体制创新,转变政府职能都要涉及到对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这必然面临诸多的矛盾及问题,有可能对社会的稳定产生一定的影响。应该趋利避害,抵御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困难,毫不动摇地发展经济。

加入WTO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均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及各地区经济也将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我们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我们克服困难的法宝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只有把经济搞上去了,我们手里的东西多了,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才能立于主动地位,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金志国:南方谈话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标准论等,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等等。这些精辟论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前无古人的。我们知道,马恩主张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经济趋于消亡,列宁在新经济时期主张发展商品流通、重视商业,也是权宜之计。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出发展商品生产,重视价值规律作用,但又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时而主张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并提出尊重价值规律、按规律办事,强调“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学校”,时而又认为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与旧社会差不多,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等等。总之,传统的理论都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而不是经济体制)来看待。反之,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提出,使人耳目一新,拨开了人们认识上的种种迷雾,为我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和建立、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于这个问题自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来,人们不断地探索、思考,付出了不少心血,也交了很多“学费”。但在邓小平“九二”南方谈话之前并没有搞清楚,甚至有误解,认为搞社会主义要把不断变革和完善生产关系摆在首位;追求所谓“平等”摆在首位;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摆在首位,搞“一大二公三纯”。甚至在“文革”期间鼓吹“穷过渡”,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平均主义,从而导致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挫折。对于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概括,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包括三个方面:生产力方面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方面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根本目的方面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生产力标准的进一步阐发和扩展,是衡量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其他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我们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落实到“三个有利于”标准上来。

聂志琦: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须有完备的法制相匹配,然而,在 92 年以前,可以说我国并不存在系统的完备的经济法律体系,只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个人所得税法》、《经济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等屈指可数的几部法律和一些经济方面的行政法规。而且在内容上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与当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是严重脱节的。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经济法制建设在这阵春风的吹拂下进入了一个茁壮成长时期,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在规范市场主体方面,制定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乡镇企业法、商业银行法等一批法律。为适应规范市场主体方面的需要还制定了《期货经纪公司登记管理暂行办法》、《企业年度检验办法》、《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等,修改了《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企业法定代表人审批条件和登记管理暂行规定》,修改了《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企业法定代表人审批条件和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规规章。在规范市场行为和市场秩序方面,制定了合同法、票据法、证券法、担保法、保险法、拍卖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房地产管理法等。国家有关部门还制定了《禁止有奖销售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配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实施,制定了《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等规章。针对合同状况,制定了《企业动产抵押物登记管理办法》、《关于查处利用合同进行的违法行为的暂行规定》等。针对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制定了《经纪人管理办法》等规章。在宏观调控方面,修改了《统计法》、《会计法》,制定了《审计法》、《预算法》、《物价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和《税法》等。实施了《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它们从核算方面明确了产权关系,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基础性条件。金融立法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担保法》、《保险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在一年之内相继出台,不仅为我国实施金融宏观调控提供了保障,而且把规范金融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纳入了法制轨道。同时,伴随着外汇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一系列外汇管理的法规规章也相继出台,如《外汇管理条例》、《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等法规。为了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加快了这一方面的立法步伐,制定了一系列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法律法规。在社会保障方面,1994 年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劳动法》。随后有《工资支付暂行规定》、《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职业教育法》等陆续颁布实施。

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不仅保障了市场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而且更重要地在于通过其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客观反映,促进并引导着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向着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方向发展。

王星闻: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提出了“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等重要论断。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我党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断深化对所有制结构的认识,调整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作了三次重大的调整决策,极大地推动了非公有制的发展。

第一次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以后。其主要标志是,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冲破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姓“资”姓“社”的羁绊。中共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更是从经济体制上解放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非公有制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第二次是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其主要标志是,明确公有制应当有多种实现形式,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理论概括,准确地指明了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所有制格局中应有的位置和作用,将非公有制经济第一次明确纳入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之内,大大拓展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是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深化,把非公有制经济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益补充”提升到“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其必将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重新认识和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载入史册。党的十五大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的提出对我国经济发展结构的内在要素增添了新的多元成份。

第三次是“三个代表”和江泽民“七一”讲话,其标志是,赋予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重要使命、提出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对新时期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了透彻的分析,第一次明确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及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充分肯定了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进一步扩大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也将产生很大影响,发挥很大的作用。从南方谈话到“三个代表”体现了求真务实,勇于创新,体现了一脉相承的思想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所以我们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进行理论创新,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品质。我党指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理论就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创造性的发展。

十年来,我们突破了对所有制的僵化认识,明确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进一步完善了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第一次明确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及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等,认识上的每次深化,理论上的每次突破,都使非公制经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实践也证明哪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快,哪里GDP总体水平就高,老百姓就先富起来。

当前,我国加入了WTO,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党员、干部队伍的状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过程中将会出现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解决,这就要求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时代潮流,立足现实国情,继续高扬解放思想的大旗,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丰富和发展我党指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理论,构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在实践中和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

许卡佳: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之际,我省上下正在广泛开展“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引发我们对安徽发展现状的种种思考。如果把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一把衡量我们今天思想解放的尺子,把周边省份作为对照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安徽的确是落后了!经济总量、综合国力、人均GDP、城市化率、核心竞争力和干部的思想观念等方面与周边的发达省份差距较大,我们有了更多的紧迫感。省委把“加快发展、富民强省”列为当前最大的政治、最硬的道理、最根本的任务来抓,抓住了关键,抓到了根本。

首先要把解放思想落实到创新观念上,大胆探索“富民强省”的新路子。加速安徽发展,我们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特征是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对外开放进入了“入世”后的新阶段,党的作风建设进入了贯彻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的新阶段。客观形势发生了深刻变

化,加快发展的任务更突出了,工作要求更高了。我们要用好的思路,求真务实的精神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来落实省委解放思想、加快发展的要求。解放思想的大讨论,使我们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发展环境不优已成为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瓶颈”;一些行政主管部门仍习惯于计划经济思维方式,市场经济意识淡漠;部门利益至上,狭隘的本位主义,不思进取,精神不振在一些干部,甚至包括我们自己身上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要加快发展,就要把这些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革除,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传统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树立起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思维方式和科学精神,在行动上牢牢把握发展这个主题,坚持以经济为中心不动摇。安徽是个农业大省,要想把安徽发展成为资源、市场两头在外的经济强省,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从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角度,全面考虑和部署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集中优势力量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进一步优化产业的区域布局,优化城乡经济结构,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不断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次,加大制度创新力度,高效率推进“富民强省”。制度创新是实现“富民强省”的根本前提。经过 20 多年的探索和创造,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体制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主要表现有三点:市场化程度不够高,尤其是生产要素领域、国有经济部门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较低,不利于市场对资源流动的调节,投资决策机制不完善,过剩的生产能力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相当一部分行业的盈利能力下降;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相脱节,收入分配制度不尽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直接抑制消费需求的增长。要落实制度创新,我省要把任务的重点放在企业制度创新、要素市场创新、所有制结构创新以及相应的投资体制、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等的创新上,以创新提高市场化程度,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和运行质量的改善。目前要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通过深化改革,架构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相衔接的产权结构、组织结构和利益结构,使企业形成降低内部成本的提高企业效益的内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采取严格的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的法律措施,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防止垄断行为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侵害。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实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跨越。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三,强化技术创新,构建“富民强省”的动力机制。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江泽民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知识和技术的运用,意味着劳动对象、生产手段和生产结果都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而加快产业升级。安徽要在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加快知识和技术创新步伐,为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我们要从七个方面入手改变目前现状。一要加大科技投入力度,逐步提高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改变目前这一比重偏低的状况;二要抓紧建设现代信息基础设施,发展信息产业,推动信息技术在各行业的运用,以工业化培育和推动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和促进工业化;三是针对安徽传统产业比重较大的特点,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跨越的同时,要积极运用现代技术改造并提升传统产业;四是要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学习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知识和先进技术,千方百计提高自身的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运用先进制造技术、工艺和设备,制造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五是创新投融资体制,建立风险投资,发展资本市场,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六要重视并大力开发人才资源,突出培养创新和创业型人才,建立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用人机制,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创业的社会氛围,以人力资本的增加赢得经济发展的相对优势;七要积极倡导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形成有利于创业和科学进步的省域文化。